



JESL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in Literature

JESL, Vol. 1, No. 1, 2026, pp.117-128.

Print ISSN: 3107-3492; Online ISSN: 3107-35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esl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esl260108epssi>



《推销员之死》中的老年贫困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保障问题

许梅花 (Xu Meihua)

摘要：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暴露了战后美国经济繁荣背景下以威利为代表的普通老年个体的贫困问题。威利陷入老年贫困，绝非个体性格缺陷所致，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拟从年龄歧视、家庭养老失效、社会保障缺位与消费信贷裹挟四个层面，分析威利老年贫困的成因、表现与本质，探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底层老年劳动者的生存困境，揭示老年贫困背后的社会保障结构性问题，从而彰显米勒在该剧中的社会批判意识。

关键词：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老年贫困；社会保障

作者介绍：许梅花，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文学与经济学跨学科研究。电子邮箱：daisy520025@163.com

Title: The Elderly Poverty and Social Security Issues of Modern Capitalism in *Death of a Salesman*

Abstract: Arthur Miller's *Death of a Salesman* exposes the problem of elderly poverty among ordinary individuals like Willy Loma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ostwar American economic prosperity. Willy's descent into old-age poverty is by no means a result of personal character flaws, but a joint outcome of multiple factors inherent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causes, manifestations, and

essence of Willy's elderly poverty through four interconnected dimensions: age discrimination, the failure of family elderly support, the absenc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entrapment by consumer credit. It explores the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of underprivileged elderly laborers within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system, reveal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al flaws in social security behind the elderly poverty, and thereby highlights Miller's social critical consciousness embedded in the play.

Key Words: Arthur Miller; *Death of a Salesman*; the elderly poverty; social security

Author Biography: Xu Meihu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s well a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E-mail: daisy520025@163.com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日益加深，衰老与老年生存话题逐渐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关切，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勃兴更是推动了文学老年学（Literary Gerontology）的纵深发展。这一学科自20世纪70年代发轫以来，始终以文学文本为依托，聚焦老年群体的生存境遇、精神困顿与社会处境，已然成为文学研究中兼具人文关怀与现实意义的显学。关注衰老，既是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关照，也是对社会结构、制度体系与价值观念的审视。将老年群体纳入社会关系框架中考察，对其经济生存状态与养老保障问题的关心，牵涉对社会公平、制度正义的本质思考。文学作品中的老年贫困话题，早已超越单纯的物质匮乏书写，成为洞察社会制度缺陷的一面镜子。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经典剧作《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正是凭借这一书写维度，展现出超越个体经验的批判力量。

米勒素有“美国戏剧的良心”之美誉，这一赞誉源于其作品始终以犀利的笔触针砭时代弊病的社会担当。在自传《文学的一生》（*Time Bends: A Life*）中，米勒（2024, p. 196）指出，“伟大的戏剧要么提出伟大的问题，要么除了技巧什么也不是。一出不想改变世界的戏剧，（…），我无法想象那值得我花时间观看”。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米勒终其一生都在以戏剧为媒介直面美国社会的病痛，希冀唤起社会的反思。《推销员之死》就是其社会批判意识的巅峰之作。该剧以推销员威利·洛曼（Willy Loman）的晚年悲剧为叙事重心，呈现了其老年经济困顿、生存无依的绝境，直指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学界现有研究已注意到该剧中的经济相关问题，譬如 Remond Williams（1966）将该剧视为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品，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只重视经济上的成功；Michael Spindler（1983）认为，这部剧揭示了企业家长式作风的虚伪性：劳动者的忠诚在经济效用贬值的逻辑面前变得毫无意义；Christopher Bigsby（2005）认为威利的悲剧是由可影响任何人的社会经济因素引起的；Naveed Yousaf（2026）则指出威利被解雇体现了“经济可弃性”（economic disposability）原则。以上研究均指涉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功利主义，但老年贫困或被当作悲剧背景，或被认为是威利美国梦破灭的结果，并未将其上升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老年生存难题进行解读，更未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制度性缺陷对老年贫困的决定性作用。

有鉴于此, 本文拟从年龄歧视、家庭养老、社会保障、消费文化四个层面, 聚焦威利的老年贫困问题, 指出其缘由并非是个性性格缺陷所致, 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剥夺了老年劳动者的经济来源, 是威利贫困的直接诱因;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失效将养老压力完全转嫁给个体, 打破了威利“养儿防老”的朴素期待;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是造成威利老年贫困的制度根源; 消费主义文化的裹挟进一步放大了其经济脆弱性, 成为压垮威利的最后枷锁。

一、 年龄歧视: 现代资本主义对老年劳动者的价值榨取

在《文学的一生》中, 米勒(2024, p. X)谈及美国社会的代际认知时, 指出: “对于美国人来讲, ‘过去’不是他们自己人生的前奏, 而是可以丢弃的东西, 就像市中心的老房子要为即将修建的新超市让位, 或者像老人, 抑或像圣诞节的包装纸一样, 这种倾向早已被无数次地注意到了”。短短几行文字既讲述了代际文化的断裂, 又表达了米勒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逻辑的批判。米勒将老年人比喻为“可以丢弃的东西”, 戳穿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老年劳动者经济价值被剥夺的残酷真相。Friedmann(1969, p.120)曾指出, 人的衰老是一种变化的表述, 正如生物衰老指的是人体机能随时间变化, 社会衰老也指的是个体角色表现随时间而变化。人们对社会衰老的认知, 最终让老年群体被社会认为“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物种”(Beauvoir, 1996, p. 15), 彻底脱离主流社会的关怀与保障范畴。这种极端认知的形成正是源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功利性逻辑, 该逻辑将老年群体简单归为非生产性人口, 认定他们会成为青壮年劳动者的负担, 在资本利益至上的原则下, 缺乏劳动价值的老年人被强制退休或无预警解雇就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常态。这属于典型的结构性年龄歧视。《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 因年老被公司无情解雇这一事件, 就是年龄歧视在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真实体现, 而这也成为威利陷入老年贫困的直接导火索。

“年龄歧视”(Ageism)由美国老年学家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率先提出, 专门用来描述对老年人的偏见。世界卫生组织(2022, p. XV)在2022年发布的《关于年龄歧视的全球报告》(*Global Report on Ageism*)中将其界定为“基于年龄而对人产生的刻板印象(我们如何思考)、偏见(我们如何感受)和歧视(我们如何行动)。它可能是制度性的、人际的, 也可以针对自己”。基于文本, 我们可以判定威利所遭遇的歧视正是制度层面的年龄歧视, 即“机构基于个体年龄不公平地限制机会并系统地使其处于劣势的法律、规则、社会规范、政策和做法”(世界卫生组织, 2022, p. XV)。劳动领域的歧视性用工、强制退休制度, 均是此类歧视的典型表现, 其本质是资本对老年人“经济无用性”的刻意建构。Beauvoir(1996, p. 18)在《论老年》(*The Coming of Age*)亦指出, “经济建立在利润之上; 事实上, 整个文明都受利润支配。人类劳动者的价值仅在于他们能否带来利润。当不再有利可图时, 就会被抛弃”。剧中, 威利为瓦格纳公司勤恳效力34年, 晚年体力衰减、业绩下滑, 便被老板霍华德无情解雇。霍华德的一句“这是买卖, 伙计, 谁都得凭本事吃

饭”^①，彻底隔离情分与利益。当威利试图凭借多年的交情寻求挽留时，却只换来“亲是亲，财是财”（p. 65）的冷酷回应。面对霍华德的冷酷，威利悲愤地呐喊：“你不能吃了橘子就把皮扔了，人不是橘子”（p. 63），这一句掷地有声的台词是米勒对20世纪美国工业资本主义下年龄歧视的最有力的控诉，高度呼应了波伏娃（1996, p. 18）所描述的老年人被视为“废弃品”的绝境。霍华德的行为远非个人残忍，而是在执行一个不承认老年价值的制度程序。在这套程序里，劳动者价值仅由年龄与收益衡量，过往贡献、经验积累皆可被清零。威利本身也内化了这种歧视逻辑，他细数年轻时单周170美元佣金、险些成为合伙人的辉煌，试图以此保住工作，却恰恰坐实了衰老即是价值衰退的社会偏见。

1948年，米勒创作《推销员之死》之际，年龄歧视已成为美国社会的普遍风气。威利请求调任纽约内勤岗位遭无情拒绝，绝非个例。同年，纽约州老龄问题联合立法委员会对172家公司进行了一项全州调查，结果显示，其中39%的公司在招聘时设置了年龄限制（Abrams, 1952）。虽然在一些需要判断力和经验的工作中，老年人更受青睐，但是“年龄上限在文职、销售、专业和管理以及非技术性职位的招聘订单中最为常见”（Slavick & Wolfbein, 1969, p. 307）。这种歧视性政策的泛滥期恰逢美国经济的重大转型。二战后军工复合体向消费主义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营销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新兴的广告业与销售行业为追求年轻化的品牌形象，刻意制造年龄与创新能力的虚假关联。社会学家米尔斯（Mills, 2016, p. 9）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The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中剖析了这种文化现象，指出销售人员等白领群体作为“人格商品”的异化处境，“他们必须面带笑容、风度翩翩，（…），在诸多白领雇员阶层中，诸如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和和蔼可亲等特点曾经是个人的品质，但现在却成了非个人的谋生手段的组成部分。如此，自我的异化是其异化劳动的伴随物”。可见，人格特质成为了销售商品、获取利润的关键，而老年劳动者无法迎合“永葆青春”的消费主义幻象，自然最先被市场淘汰。剧中，精神恍惚、疲惫不堪的“老狗”（p. 43）威利就是销售行业的过时产品，因此霍华德宣称威利不能再代表公司去波士顿，最后将其解雇。

米勒（2024, p. X）在自传中用“市中心的老房子要为即将修建的新超市让位”来形容老人在社会中被替代的命运，同样，他在《推销员之死》中借助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寓大楼”意象强化资本主义社会对老年劳动者的压迫。戏剧开篇，威利的家就被设定为一所小小的、脆弱的房子，被包围在周围坚实的公寓大楼之中（p. 4）。小屋与公寓的强烈对比已经暗示个体在资本力量面前的渺小无力。随着剧情推进，公寓大楼的“砖墙、窗户，窗户、砖墙”（p. 9）反复挤压威利的生存空间，让他愈发怀念从前庭院种满丁香、紫藤的日子，他甚至期盼能出台“禁止盖公寓大楼”（p. 10）的相关法律。威利怀念前工业时代的美好，并把眼下的一切归咎于美国“人口失控”（p. 10）。美国当时的人口数据的确证实了威利的感受。据统计，1900年至1950年间，美国总人口增长了近100%，从约7600万增至1.51亿（Sheldon, 1969, p. 32）。城市化带来人口激增，住房需求暴涨，生存竞争不断加剧，

^① 阿瑟·米勒（2008）：《推销员之死》，英若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p. 61。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如威利所言,“竞争激烈得叫人发疯”(p. 10)。可见,城市更新中的空间重组,与资本市场对劳动者生命周期的规划如出一辙。按照 Schumpeter (1942, pp. 82-83) 的资本创新理论,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破旧立新来实现资本增值,而老旧空间、老旧劳动力都难逃被抛弃的命运,用琳达的话说,就是“过了时的东西就扔掉”(p. 8)。但是,底层老年劳动者一旦失业,便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将其衰老成本转嫁给家庭与社会。如若传统家庭养老难以支撑,公共社会保障又长期缺位时,“‘又老又穷’几乎成了同义反复”(Beauvoir, 1972, p. 18)。

二、 家庭养老失效:“养儿防老”遭遇代际断裂

家庭养老并非东方社会独有的养老模式。在前工业时代的西方社会,家庭作为传统生产单位,老年人依托家族共同体,可维持相对稳定的晚年生活。学界已有研究表明,在传统西方社会中,“老年人的地位取决于他们能否通过两种方式维持自身权益:要么坚持掌控经济资源至生命终结,要么在生前转让家产时与子女达成令其满意的赡养协议”(Friedmann, 1969, p. 134)。其中,契约式赡养的实现,高度依赖社会的低流动性、个体生存选择单一、家族世代聚居的传统社会结构,一旦社会结构步入现代化转型,青年一代拥有独立谋生与迁居自由,基于财产捆绑的代际赡养约束便自然松动,代际经济隔阂与情感疏离随之滋生,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逐步走向解体。这一社会转型引发的养老危机在《推销员之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剧中,威利家族本就亲历 19 世纪末西进拓荒迁徙,步入 20 世纪后,现代化进程彻底颠覆了原有的生活结构。工业化消解了家庭的生产联结,城市化与战后人口流动瓦解了世代同居的居住格局,青年子女向外择业、迁居独立生活,逐渐疏离原生家庭的赡养责任。威利对被解雇的激烈抗拒,根本原因就在于老无所依的生存焦虑,而其悲剧本质,正是传统家族式养老伦理在工业化、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浪潮中全面崩塌的缩影。

首先,家族西迁与社会的高流动性拉大了代际地理距离,从根源上动摇了传统家庭养老根基。前文已经提到,在父权制社会中,大家庭里的老人地位相对稳固。但美国并无长期盛行大家庭制的历史依据。Friedmann (1969, p. 131) 通过统计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三代同堂或大家庭曾经在美国盛行,甚至是一种常见的家庭形式。也无从证实历史上多数老年人依靠此类模式获得赡养。”而美国社会与生俱来的高流动性,从根本上阻碍了大家庭的形成与维系。自殖民地时期到 19 世纪,西部边疆的拓荒模式催生了核心家庭独立谋生的形态,即便在乡村地区也未形成稳固的大家庭聚居格局。Calhoun (1917-19) 认为,拓荒环境形成的特殊经济格局,客观上推动着儿童与青年的解放,而当父母过度伸张特权或试图在儿子成年后仍保持控制时,亲情裂痕便有可能产生。这一历史特征,在威利家族身上得以具象化。威利的父亲在威利幼年时,便举家从波士顿出发,向西闯荡谋生,辗转俄亥俄、印第安纳、密歇根、伊利诺伊等州,“整个西部都跑遍了”(p. 36)。这位长笛手艺人的家族迁徙,虽带有传统家族共生的痕迹,本质却是工业文明冲击农耕社会的必然结果。持续的空间迁移,彻底割断了家族技艺传承与情感联结。威利与哥哥本(Ben)均未继承父亲的手艺,本深入西部丛林拓荒,而威利则留居纽约成为一名推销

员，之后兄弟二人各自离散。威利对父亲也毫无印象，感觉自己“没根似的”（39），更无从履行赡养义务。这种家族养老的断裂，也直接复刻在他与子女的关系之中，为晚年的老无所依埋下伏笔。

其次，工业化切断了代际经济纽带，加剧了代际情感疏离，最终彻底摧毁了传统家庭养老的物质基础。前工业社会中，家庭既是生产单元，也是天然的养老保障体系，土地与长子继承制维系着家族经济与代际赡养的完整性。近代商业扩张、跨大西洋贸易兴盛与新大陆移民，逐步瓦解了传统长子继承制赖以存续的社会基础。而 20 世纪美国工业化后期，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则彻底打破了代际经济联结。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003, p. 179）指出：“战后的福特主义必须被看成较少是一种单纯的大规模生产的体制，而更多的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打破了家庭内部技艺代际传递的可能，让劳动者彻底依附于工业化生产体系。剧中，汽车作为工业文明的符号，成为威利家庭关系疏离的关键见证。威利常年驾车在外推销，缺席子女成长，将雪佛兰八万英里的行驶里程等同于自身的职业价值，正是福特主义在推销行业规模化运作的体现。作为传统家长观念的信奉者，威利始终希望子承父业，而长子比夫却拒绝这种异化的生存模式：他鄙视工业社会“效率至上”的法则，厌恶都市的快节奏与商场的逐利之风，拒绝接受父亲灌输的成功神话，以“适应不了商界的那套”（p. 46）为由，一心追求西部牧场生活。工业化催生的高流动性，进一步弱化了子女的赡养责任。比夫战前离家十余载，长期与家庭断联，既无赡养意识，也无赡养能力，周薪不足三十五美元，还沾染恶习；次子哈皮周薪七十美元，却全部用于个人享乐，完全违背“爸，我说过要您退休，我养活您”（p. 30）的承诺。父辈无法再通过土地、手艺为子女提供生产资料，子女也丧失了赡养长辈的经济基础，代际财富积累变得毫无可能。比夫曾试图分担家庭压力，承诺工作后接济父亲，却因威利始终以市场功利思维对待亲子关系，代际经济互助最终让位于利益算计，比夫打算再度离家。其口中“要是我发现油田，我准给您寄张支票来”（p. 102）的承诺，不过是虚幻的慰藉，工业社会的契约逻辑早已摧毁了传统孝道的物质根基。

再次，城市化对传统家庭空间的侵蚀，改变了家庭空间的功能，也加速了子女对家庭赡养责任的逃避。美国 19 世纪便开启乡村到城市的转型，一战后城市格局基本定型：市中心集聚商业与产业，居住区向外扩张，郊区空间被持续挤压，商业资本不断侵占传统社区。威利家是带有庭院的独立住宅，伴随城市化推进，“这所小小的、脆弱的房子被包围在周围坚实的公寓大楼之中”（p. 4），原本具备种植功能的庭院变成了钢筋水泥包围的牢笼，这不仅剥夺了家庭养老的物质基础，也切断了由共同劳动维系的亲情联结。在传统农耕文明中，家庭空间本身带有伦理属性，开放的庭院保障着代际间的物质互助与情感交流。城市化大幅推动之前，威利与孩子们一同修缮房屋、搭建吊床的共同劳动，本身就是在建立基于互惠的赡养契约。但这种契约需要稳定的空间作为前提，当家庭成员共享的物理空间被功利化的城市建设挤压时，其功能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米勒通过家庭内部空间的层级设计，进一步暗示了代际互助关系的断裂。厨房为下沉空间，子女卧室高出六英尺半，光线昏暗、闭塞压抑。文本多次呈现威利和妻子在厨房为生计发愁，而两个儿子躲在房间里，即便听见也置之不理的场景。由此，家人间的互动从

面对面交流变为背对背的疏离。厨房本是共享天伦的场所，却成为全家争吵、焦虑、为生计发愁的苦闷空间。威利指责子女、琳达哀求孩子、夫妻二人为贷款焦灼，所有矛盾都在此爆发。家庭空间彻底丧失温情与伦理功能，比夫“恨透了这座城市”（p. 44），一心想逃离至无贷款、无压力的西部牧场，哈皮也独居在外。二人皆以逃离的方式，回避令人窒息的家庭责任。最终，威利与琳达成为空巢老人，既无子女的情感陪伴，也无经济支持，老年贫困愈发深重，“养儿防老”的期望彻底破灭。

Gordon（1969, p. 209）总结道，“伴随工业化带来的地域流动性提升与城市化进程，持续削弱家庭纽带，并改变成年子女对赡养的态度”。Friedmann（1969, p. 135）的分析更具体，他认为，“代际之间的地理分离——无论是英国青年移民殖民地、拓荒者的子女在邻州建立新农场，还是欧洲农民进入美国城市工厂——都瓦解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威利的悲剧印证了在现代化浪潮下，美国传统家庭养老的纽带本已然彻底断裂的事实，而彼时资本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严重缺位，压根无法填补家庭养老失灵后的空白，成为将其推向绝境的关键诱因。

三、 社会保障缺位：老年贫困的制度性根源

20 世纪 40 年代老年贫困已被列为美国核心社会问题。如 Gordon(1969, p. 208) 所说，“过去二十年，美国在建立全面的老年人经济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老年贫困仍然是最持久、最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这一论断也契合了老年学学者 Achenbaum（2019）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主要是政策制定者对老年人失业和贫困加剧的一种仁慈回应。据此，在社会福利范畴内，“贫困老年人”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标签，这一身份既由年龄界定，也取决于个人的自给自足能力（Friedmann, 1969, p. 136）。在《推销员之死》中，63 岁惨遭解雇、丧失经济来源的威利，正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尽管彼时美国社会已逐渐承认“贫困老人”“受赡养老人”这类身份界定，但战后初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覆盖范围有限、准入条件严苛、制度执行缺位等诸多问题，威利这类底层老年劳动者，始终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也成为其陷入绝境的制度诱因。

威利的职业属性，从根源上就决定他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1935 年美国《社会保障法》的出台虽属社会保障领域的里程碑事件，但美国社会保险立法远晚于欧洲国家。据相关数据显示，1935 年该法案通过时，全球已有 23 个国家推行强制医疗保险，20 个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10 个国家实施强制失业保险计划（Epstein, 1936），部分国家还设立了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在此之前，美国仅有个别州出台过老年援助相关法律，实际执行效果微乎其微。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爆发后，各州财政无力供养激增的老年贫苦人口，家庭也失去赡养老人的能力，加之社会亟需将老年人移出劳动力市场，为年轻劳动者腾出岗位，同时社会价值观念也发生转变，要求联邦政府分担老人赡养责任，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 1935 年《社会保障法》的落地（Friedmann, 1969, p. 137）。但该法案的保障范围极其有限，仅覆盖工商业正式雇员，明确将报童、部分家庭雇工、农业工人、非固定家政人员以及低收入自雇者排除在外（Gordon, 1969, p. 230）。威利作为佣金制推销员，雇佣关系松散，并非企业正式在册雇员，即便在瓦格纳公司供职 34 年，也因收入模式灵活、无固定劳工资质，始终不符合法案规定的参保主体资格，自然无法享受任何社保福利。《推销员之死》创

作于 1948 年，而 1935 年《社会保障法》直至 1950 年才完成全面修订，大幅度提升保障覆盖率，威利的情况只能适用旧法案，注定无法获得任何制度性保障。

威利被公司解雇时无任何遣散费、失业补偿，进一步证明了公司从未将他视作享有完整劳工权益的正式员工。理论上，失业保险应成为失业者的生活保障来源，但 1935 年法案将失业保险的执行权力下放至各州，导致各地资格认定标准混乱不一。威利极有可能因社保缴费记录不达标，或是其他理由，被剥夺领取失业救济的资格。威利对退休的强烈抵触也反映了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老年劳工的普遍心态。正如 Friedmann(1969, p. 130) 所言：

老年工人对这些分离程序的抵制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最为明显。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维持退休生活所需的个人财务储备大幅减少。尽管工业体系为老年工人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但却未能满足这一群体的就业需求。在此期间，政府和工业界新推出的退休收入条款也未能充分满足新退休工人的需求。

事实上，美国正规退休福利制度与工业养老金体系直至 1950 年才正式建立，威利所处的时代，根本无成熟退休保障可依。

即便威利侥幸符合参保条件，老年保险（OASI）的严苛准入门槛与微薄待遇，也无法支撑其基本生活。法案明确规定，劳动者需在 1937 年社保制度实施后，工作满 10 年、缴满 40 个季度的社保费用，且年满 65 岁后方可申领养老金。威利虽满足社保制度实施后的 10 年工作年限，但因后期收入极其不稳定，大概率未达到最低缴费标准。即便达标，早期养老金待遇也极度微薄。1935 年法案规定的最低老年福利为每月 10 美元，1954 年法案修订后，也仅提升至每月 30 美元（Gordon, 1969, p. 233）。以威利的收入水平，他只能领取最低标准的养老金，在 20 世纪 40 年代该福利月均发放额不足 25 美元。然而，根据威利妻子琳达核算的家庭月均必要开支远超 100 美元，若能领到养老金，也不足以覆盖其基本生活。更为关键的是，米勒将威利被解雇的年龄设定为 63 岁，如此，他距法定申领养老金的年龄尚有 2 年，而他却无任何积蓄支撑过渡期的生活，这意味着他的生存会更加艰难。

此外，彼时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医疗与残疾保障方面的完全空白，进一步加剧威利的身心崩溃。1935 年《社会保障法》完全未涉及医疗保险内容，残疾保险直至 1956 年才被纳入社保范畴。威利作为旅行推销员，常年驾车奔波推销，长期高压劳作引发严重精神障碍，出现幻觉、幻听与自杀倾向，其症状已构成职业相关精神损伤，但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既无医疗补助，也无残疾津贴可申领。雇主霍华德明知其身心异常，仍执意解雇，尽显资本对老年劳工健康权益的彻底漠视。社保制度的缺失，让威利丧失了体面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所有途径。这套制度的缺陷，将威利这样的高龄劳动者逼入绝境，没有足够的积蓄养老，也得不到国家的退休保障，最终只能依靠私人救济、人寿保险这类毫无保障的方式求生。

然而，邻居查利每周借给威利 50 美元，并非长效救济，而是前现代私人慈善在福利国

家体系缺位下的异化延续，是维系威利最后尊严的虚假缓冲。19 世纪“科学慈善”的理念将贫困归咎于个人道德缺陷，这一观念延续至 20 世纪，人们甚至觉得“贫困是可以治愈的”（Friedmann, 1969, p. 137），认为私人救济能够替代公共救济。当威利拒绝查利提供的差事，对着他怒吼“我不能在你手下干”（p. 76）时，既是在摆脱清教传统中将接受援助视为人格污点的道德审判，也是在反抗资本逻辑下“债务即控制”的新型依附关系。最终，他选择自杀以换取 2 万美元保险金，成了对失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尖锐的讽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悲剧的酿成，绝非单一的制度缺位所致。当时美国盛行的消费信贷文化，进一步将威利推入无法逆转的财务深渊。

四、 消费信贷：老年贫困的精神枷锁

《推销员之死》创作于 1948 年，恰逢美国经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的关键时期。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中所描绘的消费主义社会图景，正是威利悲剧发生的时代土壤。战后的美国为消化战时积累的过剩产能，将大众消费置于经济发展的重心。生产的目的不再局限于满足真实需求，而是转向主动制造消费欲望，消费也由此脱离物质实用的本质，成为一种心理与情感层面的理想化实践。与此同时，商品被赋予符号意义，成为建构个人身份、实现社会交流的工具。在“拥有即成功”的消费主义神话裹挟下，大众逐渐沦为信贷体系的附庸，威利的老年贫困，正是底层劳动者被消费信贷文化吞噬未来的写照。

威利一生笃信美国梦，却被消费文化扭曲了追梦路径。Adams（1931, pp. 405-406）所定义的美国梦是“根据各自的能力或业绩，人们的生活应该更美好，更富裕，更充实”，其核心是机会均等与自我实现，追求的是更美好、更充实的生活本身，而非单纯的物质富足。而美国消费文化的兴起彻底扭曲了美国梦的精神，大众将物质财富的积累当作衡量生活质量的唯一标准，美好生活被简化为房产、汽车、家电等耐用品的堆砌。正如伦德尔·卡尔德（Lendol Calder）（2007, p. 7）所言，消费文化定义的美好生活，就是拥有更多市场上的商品。这种价值取向重塑了威利的认知，他坚信“招人喜欢”“仪表堂堂”就能换取商业成功的片面成功学，将人生目标浓缩为一套具体的物质清单，试图通过占有这些商品来确立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这就是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符号消费的典型表现。在符号消费的逻辑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波德里亚，2000, p. 48）。威利对物质商品的执着，本质上是对消费符号所代表的成功身份的执念，而这一执念恰好被消费信贷体系所利用。

战后消费信贷“先享受、后付款”的模式，颠覆了传统消费伦理，将威利引入债务的陷阱。战前，美国社会恪守先储蓄后消费的准则，而战后消费信贷制度自 1915 年后的 20 年间逐步形成根基（卡尔德，2007, p. 15），通过分期付款、小额贷款等方式大幅降低消费门槛，让普通个体得以快速占有商品。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鼓励信贷消费的口号“诸如‘先买后付账！’和‘利用我们的轻松付款方法！’”已经成了美国消费群体语汇中的标准用语”（卡尔德，2007, p. 17）。威利正是这一消费模式的忠实执行者，其房产、汽车、家电等所有耐用品，均通过分期付款购得，而他的房屋和汽车购置时间，恰好处于美国信贷网

络结构形成的 20 世纪 20 年代。琳达在厨房念叨的各类分期账单，如“冰箱得交十六元”“风扇得交一元八毛”“洗衣机得付九元六”“到十五号得交三元五的吸尘器的分期付款”“屋顶，还剩二十元”（pp. 25-26），既是这个家庭经济困境的直观写照，也是威利透支未来以维系中产体面的有力证明。他并非被迫消费，而是主动以信贷堆砌身份幻象。但是，消费信贷的吊诡之处在于将消费的快乐前置，将支付的痛苦延后。卡尔德（2007）所言的克制与挥霍的平衡，对于威利这类收入不稳定的底层劳动者而言，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表象，一旦收入中断，虚假繁荣便瞬间崩塌。

消费信贷的隐性陷阱，从根本上阻断了威利的财富积累，放大了社保缺位带来的生存危机。分期还款的刚性约束，是消费信贷最直接的陷阱，“在分期付款融资方式中，货币被出借——或者被商品销售——的条件是，借款人或购买人在特定时段里以固定支付的方式定期偿还贷款”（卡尔德，2007, p. 15），这种刚性支出会大幅挤占个人收入用于储蓄和资产积累的空间，最终让威利陷入赚多少、还多少的恶性循环，无法形成任何实质性的财富积累，更无抗风险能力。同时，隐性利息、复利成本与商品计划性报废构成多重压榨，威利不禁感叹：

我真盼望，哪怕一辈子有一回呢，等我付清了分期付款之后，东西还能不坏！我现在是一天到晚跟垃圾场竞赛呢！我这辆汽车款刚刚付清，这辆车也快要散架了。电冰箱跟疯子似的一根接着一根吃传动皮带。他们生产这种东西的时候都计算好了，等你付清最后一笔款，东西也就该坏了（pp. 55-56）。

该引文生动地揭露了信贷体系与商品生产的隐秘共谋，即消费者为持续贬值的商品支付超额费用，债务结清之时，商品也丧失使用价值，新一轮负债随之开启，最终让劳动者永远无法完成实质性财富积累。消费信贷创建的无限债务循环，最终将威利推向老年绝境，其人生轨迹恰好印证了信贷致贫的完整逻辑。青年时期，他透支未来收入购置商品，以债务换取中产体面，埋下贫困隐患；中年时期，业绩下滑、收入缩减，刚性债务却未减少，收支彻底失衡，无任何储蓄与资产；老年时期，惨遭解雇失去全部收入，社保体系又完全缺位，既无生活来源，也无力偿还债务，长期积压的压力全面爆发，最终沦为消费信贷与制度缺位的双重牺牲品。

加尔布雷思（1965）在《丰裕社会》中警示，一个建立在不断创造新需求基础上的经济体系，本质上是不健全、不可持续且不道德的。该体系将消费从满足真实需求的手段，异化为维持生产体系运转的目的，而消费者则成为这一体系的附庸：为了偿还债务必须不断工作，为了维持生产体系必须不断消费，为了满足消费需求又必须不断负债。威利努力工作不再是为了自我实现，而是为了偿还账单；消费不再是为生活所需，而是为维系虚假体面；为了维持体面，又必须继续工作、继续消费、继续负债。当劳动能力无法支撑这一

循环，贫困与毁灭便成为其无法逃脱的结局。“威利·洛曼的原型不止一个”（米勒，2024, p. 137），而是战后美国消费主义浪潮下，无数底层劳动者老年命运的真实缩影。

米勒（2024, p. 73）在自传中坦言：“我在二十多岁时就觉得自己老了，觉得时间像个砂轮要将我碾碎。不过我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微不足道。”即便是米勒这样久负盛名的作家，尚且怀有对生命价值消弭的恐惧，更何况威利这般底层老年劳动者。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剥夺了他的劳动价值，传统家庭养老失灵让他老无所依，资本主义社会保障体系完全缺位，消费信贷债务又将他的未来彻底透支。这些压力共同作用，催生了他晚年的生存焦虑与精神绝望，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底层老年群体的普遍困境。米勒在剧中借琳达之口发出呐喊：“可是他是个人，他现在正遇上灾难。所以必须关怀他，不能让他像条老狗似的死了埋掉。关怀，对这样一个人必须关怀”（2008, pp. 42-43），这份呐喊绝非单纯的情感抒发，而是对底层老年劳动者生命尊严的捍卫，更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漠视老年生存权、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的尖锐批判。《推销员之死》的社会批判价值，早已超越文学文本本身，成为影射美国社会制度缺陷、推动社会反思的重要镜像。该剧1949年首演后便引发强烈社会回响，连锁百货总裁伯纳德·金贝尔（Bernard Gimbel）观演后当即废除超龄解雇制度（米勒，2024, p. 208），这便是作品极具现实冲击力的最佳体现。剧评人 Brooks Atkinson（1949, p. 1）对威利“尘埃归于尘埃，突然间，一无所有”的评价，简洁而有力地概括了底层老年群体的宿命，也推动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老年平权思潮的兴起。1950至1951年全美老龄问题会议召开、1967年《雇佣年龄歧视法》颁布，均可视作该剧社会影响力的直接回响。

但必须正视的是，政策与法律的完善，并未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核中的年龄歧视与保障不公的基因。后工业时代零工经济兴起、灵活就业模式下，老年劳动者的保障困境、贫困危机以新形态持续重演，威利式悲剧并未消失。《推销员之死》历经数十年仍具有现实意义，既表明了米勒创作的历史穿透力与人文深度，也验证了老年贫困、社会保障缺失，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难以消解的结构性矛盾。该剧始终让我们警醒：老年群体的生存境遇，是衡量社会文明与制度正义的重要标尺，唯有打破资本至上的功利逻辑，建立普惠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真正避免威利式的悲剧反复上演。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美国文学早期对华贸易书写与帝国建构”（项目编号：23YJC75202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Funding: This article is one of the interim finding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und Project "The Early China Trade and Empire Constructio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Project No.: 23YJC752023).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Xu Meihua ^{ID} <https://orcid.org/0009-0009-4226-9431>

References

Abrams, A. J (1952). *Barriers to the Employment of Older Workers*. Ann. Am. Acad. Political & Social Sc.

- Achenbaum, W.A(2019). *Old Age in the New L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since 1970*.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Adams, T (1931). *The Epic of America*. Little, Brown.
- Atkinson, B (1949-02-20). "Death of a Salesman." *New York Times*, 20 Feb.Sec.2:1.
- Beauvoir, S (1996). *The Coming of Age*. W.W.Norton &Company, Inc.
- Bigsby, C (2005). *Arthur Miller: A Critical Stu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lhoun, A. W (1917-19).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amil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Arthur H. Clark Co.
- Epstein, A (1936). *Insecurity: a challenge to America*. Random House.
- Friedmann, E.A (1969). "The Impact of Aging on Social Structure" in Clark Tibbitts (Ed), *Handbook of Social Gerontology: Social Aspects of Ag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0-144.
- Gordon, M.S(1969). "Aging and Income Security." in Clark Tibbitts (Ed), *Handbook of Social Gerontology: Social Aspects of Ag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8-260.
- Schumpeter, J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Brother.
- Sheldon, H.D(1969).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 Profile." in Clark Tibbitts (Ed), *Handbook of Social Gerontology: Social Aspects of Ag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7-61.
- Slavick, F. & S. L. Wolfbein (1969). "The Evolving Work-Life Pattern." in Clark Tibbitts (Ed), *Handbook of Social Gerontology: Social Aspects of Aging*: 298-329.
- Spindler, M (1983).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Palgrave Macmillan.
- Williams, R (1966). *Modern Traged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ousaf, N (2026). "Self-annihilation as Final Testimony: Trauma, Witnessing, and Economic Disposability in *Death of a Salesm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esol* (01): 592-605.
- 米勒 (2024): 《文学的一生》, 蓝玲, 林倍加, 梁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Miller, A (2024). *Timebends: A Life*. Trans. Lan Ling & Lin Beijia.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米勒 (2008): 《推销员之死》, 英若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Miller, A (2008). *Death of a Salesman*. Trans. Ying Ruoche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波德里亚 (2000): 《消费社会》, 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Baudrillard, J (2000). *Consumer Society*. Trans. Liu Chengfu & Quan Zhiga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哈维 (2003): 《后现代的状况》, 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 [Harvey, D (2003).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Trans. Yan Jia. The Commercial Press.]
- 加尔布雷斯 (1965): 《丰裕社会》, 徐世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Galbraith, J. K (1965). *The Affluent Society*. Trans. Xu Shiping.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米尔斯 (2016): 《白领: 美国的中产阶级》, 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Mills, C. W (2016).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Trans. Zhou Xiaoho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卡尔德 (2007): 《融资美国梦: 消费信贷文化史》, 严忠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Calder, L (2007).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Trans. Yan Zhongzh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世界卫生组织 (2022): 《关于年龄歧视的全球报告》。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 *Global Report on Ageism*.]